

宏观视野下的跨学科研究佳作

——《守制与应变：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评介

徐 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孙诗萌副教授《守制与应变：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一书于2024年7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清代台湾的城市规划为切入点，从“守制”与“应变”出发，详细论述了清代台湾城市的发展历程、选址规划与山水格局、功能空间要素等方面，展现了一幅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的动态图景。该书还通过详细分析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这样的典型案例，指出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可谓奏响了“中国古典规划之绝响”的精彩乐章。该书视角新颖、史料扎实、方法多样、论述严谨，不仅为理解清代台湾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揭示出台海两岸之间的密切关系，呈现了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正统观念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一、全国视野中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

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将视野局限于台湾岛内，而是放眼于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大背景。较之前人，作者从一时一地的研究中跳脱出来，在研究的视角上有着较大的进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建筑学界，既有的清代台湾城市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但不少研究仍局限于清代台湾城市本身的发展变化上，岛内一些学者甚至在相关研究中对两岸在城市发展上的紧密联系避而不谈。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城市规划这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决策上，受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理念影响甚为深远。这些理念在高层会影响士大夫和官员，在基层也会影响负责营造的技术人员，乃至普通百姓。清代两岸间的紧密联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更是能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体现出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作者从山水格局这一中国城市选址传统出发，仔细分析了清代台湾城市的选址模式。作者认为，清代台湾城市选址和布局大体分为“山前模式”（背倚中央山脉的西侧分支余脉，面向台湾海峡）和“盆地模式”（山间盆地）。据此，作者分别以诸罗县城等5例和恒春县城等4例为代表分析了两种模式。通过对城市规划的过程、考量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的考察，作者发现“山前

^{*} 徐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模式”的 5 座县城规划都选了大山之下的小丘西麓,东倚高山,西瞰平原和海口,南北有二溪夹流,中踞高地,“‘倚山’‘夹溪’‘踞高’‘居中’是共同的选址原则”。(第 127 页)而“盆地模式”的 4 座城市的选址都位于盆地地形的中心位置,尤其偏爱大山之麓、二水夹流的中高之地,与“山前模式”城市所遵循的“倚山”“夹溪”“踞高”等选址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第 163 页)这些选址原则并非台湾城市规划的独创,而是根据大陆城市规划的传统和积累的知识,可见两岸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山水格局的“可见层次”和“可感层次”。作者提出,城市四望可见,直接影响其规划的山水要素,与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是“可见层次”;城市四望不可见,但仍然对城市的规划等产生影响的山水要素,与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是“可感层次”。与“可见层次”对应的建构程序是在地图和实地都肉眼可见的“实质性建构”,与“可感层次”对应的建构程序是以文字方式记录在地方志等文献中的“文本性建构”。从可见到可感,由实质性建构至文本性建构,这样全面且复杂的建构体系,既是在精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显然是继承于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

其次,作者对台湾城市建设中的功能空间要素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作者从时序出发,将治署、城垣、学宫、坛庙这 4 类中国传统城市中最重要空间要素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对其进行考察。作者研究发现,清代台湾省 19 个府州县厅中除台湾府外都建有治署,且大部分治署都是在设治后 1—5 年内建设的;16 个府州县厅筑有城垣,但大多数是在设治 10 年以上者筑城;15 个府州县厅设有不同形式的学宫,设治后 1—5 年内建学者较多。至于坛庙中城隍庙建置率高,社稷、山川二坛多同时建设,邑厉坛建设时间灵活。作者总结认为,总体建设时序呈现多样性,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条件相关。但是,不论建设的顺序如何,大部分的台湾城市仍然遵循了中国城市建设传统。无论是政治功能极强的治署、防御寇匪的城垣、教化地方的学宫,以及祀典必备的坛庙都是传统中国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作者着重分析了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的选址和规划。作者提出,比之前期的城市,这两座清代台湾最重要的城市的规划更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原则与方法,表现在选址理念、规模理念、塑形理念、择向理念、配置理念、实施理念等各个方面。选址既在“辖域”之中,又在“山水”之中;城垣规模与其行政等级之间表现出特定关联则体现了中国古制;城垣形态则表现出对理想“八卦形”的强烈追求;地方行政设施的建设中则体现出明显的文教设施建设先行的特征。

由此可见,清代台湾城市的建设深受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的浸染,不仅在规划和选址中,而且在建设过程中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尊崇与坚守。作者不仅考察了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的规划和建设,而且比较了清代最后设置的 5 座省城,发现奉天、吉林、黑龙江 3 省仅是沿用了旧城,只有新疆、台湾两省建设了新省城,而台湾省城的建设比迪化府城更为全面,所以“台中省城这样一座遵守传统规制又富于象征意涵的理想城应运而生”。(第 231 页)

此外,清代台湾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坚守中华传统,其联系纽带之一就在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人员往来。在台湾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勘定选址规划既得到地理先生基于大尺度山水格局的建议,更是由台湾官员和福建省官员,乃至闽浙总督(噶玛兰厅城、凤山新城等城的选址皆由闽浙总督巡台时实地勘察)勘定。其间,崔毓英等福建官员、刘铭传等台湾主要官员,陈星聚、刘璈等地方官员和技术人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台湾城市的样态。可以说,清代台湾 16 座城市的营建是由大陆渡台官员和技术人员主导,在两岸人民共同参与下完成的。

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将清代台湾城市规划放置于全国视野之内,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展现了一个颇有启发的跨学科研究。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掌握和使用是热门且重要的,但其难度也确实较高。历史学和建筑学在学科分野中看似互不相干,但是若将其融会贯通,便可看到单一学科不甚关注的学科领域,做出新的富有创见的研究。该书便提供了一个有益探索的案例。

首先,贯通把握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研究。就历史学而言,大部分历史学者更为关注时间,对时间因素很敏感,空间因素的敏感性相对差一些。当然,历史学中也有较为关注空间的分支领域,如历史地理学,但这种关注仍然是建立在时间性的基础上。历史学往往在关注空间的同时,更希望能够挖掘出背后的故事。建筑学的研究更专注于对空间形态的考察,即便在建筑史中,相关学者也更为强调以建筑学的方式进行实地测绘等工作。

历史学和建筑学二者尽管各有侧重,但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在城市史的研究中。对历史学而言,更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本身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如在台湾史的研究中,更受关注的是国家政策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建筑学而言,除了关注城市空间变迁外,若能深入探究城市背后的历史脉络会使得研究更为丰富。

该书将历史学和建筑学两个学科相结合,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作者研究的是清代台湾的城市规划,以大量的地方志和档案为基础,在第2章就梳理了清代台湾的行政区划及城市建置的历程及特点。不仅如此,作者还分析了当时城市的空间分布、人口规模、军事驻防、水陆交通等情况,解读了清代台湾政区变迁及城市演进的深层动力。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利用大量的图表和地图,既清晰地展示了台湾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呈现了清代台湾开发的过程。在其后几章的叙述中,作者对于时间和空间也有较确切的把握,一方面以现代制图方法绘制了大量的山水地形图,结合古代舆图,形象地展示了台湾城市建立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在行文中讲述了清代台湾城市选址和规划的过程,体现出了厚重的历史感。

其次,具有打破学科边界的创新性思维。跨学科研究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为了解决复杂问题而采用的研究方法。在清代台湾开发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单纯的建筑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都难以对清代台湾城市发展做出整体性、全景性的研究,需要综合两个学科才有可能在研究上有所突破。作者没有局限于建筑学或历史学的单一学科方法,而是自始至终地从问题出发,为解决问题而综合采用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学术研究史的回顾篇章中,作者既涉及了历史学方向的筑城史研究、城市体系与城市选址研究、地区开发研究,也关注了建筑学方向的城市空间变迁研究、风水与城市规划建设研究、城内建筑设施研究、地图中聚落与城市研究,还注意到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地景书写中的空间变迁研究。

该书的重要问题意识是探讨清代台湾城市发展模式,其提出的清代台湾城市发展从“山前模式”转向“盆地模式”变化过程结合了历史学和建筑学的不同方向,既考虑到了内乱外侵的刺激,更看到了台湾天然山川形势,也综合考虑了族群治理的需要和资源开发的驱动。由此可见,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结合不同的学科特色,对研究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除了书中的论述外,图和表的使用是该书的一大亮点,而且一目了然地展现了该书的跨学科研究特色。该书中的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古代的舆图,其中又可以根据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地方志书中的图,如山水形势图、某某城图等,另一种是古代的舆图,这些图往往是在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使用较多;二是作者自己绘制的地形图,这类图是建筑学中常用的;三是作

者实地考察时拍摄的照片。这三类图的使用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针对同一城市对照使用,再加上作者结合三者的介绍分析,使得读者一目了然,豁然开朗。同时,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表作为分析方法。如作者使用了“清代台湾府州县厅治署规划建设时序”“清代台湾府州县厅城垣建设信息”等表格和示意图用以呈现台湾城市发展历程,不仅是图片,甚至表格也做得规范、漂亮,显然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杰作。在历史学中,使用表格和图片来辅助说明文章内容并不鲜见,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图片和表格(文中至少使用了数百张图片,数十份表格)来解释和说明问题的研究是较少见的。这样的研究又能够紧密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可称得上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

最后,跨学科研究依赖多学科研究方法和基础材料的深度融合。作者作为建筑学学者,对于城市建筑史、规划史、建筑设施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自是驾轻就熟,对于历史学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与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也具有相当的水准。作者一方面使用了建筑学中的遥感影像及高程数据,近现代学者复原研究、史地调研测试数据及影像资料等,另一方面整理应用了大量台湾地方志、清代台湾档案、地方官员文集、历史与地图等史志资料。两个学科的资料使用得心应手,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这既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规划史研究,对地方志较为熟悉,更说明作者对地方志的搜集和运用下了很大的功夫,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地方志中关于城址如何选择的这一部分,往往是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但是历史学和建筑学相结合的研究中,这一部分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譬如,关于城市规划与清代台湾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加以深化。作者在论述一些问题时,部分判断仍采旧说,如对于清政府的治台策略,仍从“消极治台”到“积极治台”的转变方向加以论述(第 48 页),未能关注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观点的深入批评。但瑕不掩瑜,这些方面无损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李细珠)